

蘭亭論辨

兰亭论辨



文物出版社

一九七三年·北京

出版说明

《兰亭序帖》被唐太宗李世民断定为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“真迹”后，经过历代帝王重臣的竭力推崇和封建士大夫们的大肆宣扬，视作不可侵犯的“神物”。作伪者又乘机制造出不少赝品，使我国书法源流造成了混乱。长时期来，对《兰亭序帖》的极度迷信，一直占统治地位；影响之深，远及今日。虽有少数清代学者如李文田提出疑议；但没有充分发挥，由于积重难返，遭受反对，不久便被埋灭了。

一九六五年，郭沫若同志在《文物》第六期上发表了《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》一文，进一步否定了王羲之书《兰亭序》的可能性，指出不仅书法是依托，连序文也经后人篡改。郭沫若同志的看法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讨论，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，多数文章赞成郭沫若同志的意见，支持他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态度推翻历代帝王重臣的评定；但也有文章持相反的看法。“兰亭”真伪之争，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。

应当指出，这种争论反映了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斗争。只要我们认真贯彻党的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学术上的是非问题，就会越辩越明。这无疑会有助于学术研究的开展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。

本书所收，就是这次“兰亭”真伪之争的部分文章。我们按立论不同，分为上编和下编两部分。上编收有郭沫若同志以及与之观点一致的文章，下编收有与郭沫若等同志观点相对立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章。通过本书的出版，读者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到这次争论的梗概及其实质。这对于我国书体史、书法史以及文字发展史的研究，都有一定的意义；特别是在鉴定书法问题上、乃至在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广袤领域中，如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，将会有所启发。

在蒐集成书时，其中有些文章，作者作了某些个别文字上的修改或补充；也选收了根据新近发现的出土文物所撰写的文章。

由于编辑时间仓促，水平有限，缺点和错误之处，谨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一九七三年三月

上 编

目 录

上 编

- 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《三国志》残卷 郭沫若 (1)
- 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 郭沫若 (5)
- 《驳议》的商讨 郭沫若 (33)
- 《兰亭序》与老庄思想 郭沫若 (42)
- 论《兰亭序》的两封信 宗白华 (46)
- 东晋字体没有脱离隶书笔意 王一羽 (48)
- 揭开《兰亭序帖》迷信的外衣 龙 潜 (61)
- 《兰亭》的迷信应该破除 启 功 (69)
- 《兰亭序》并非铁案 于 硕 (77)
- 《兰亭序》真伪的我见 徐森玉 (83)
- 从字体上试论《兰亭序》的真伪 赵万里 (91)
- 东吴已有“暮”字 于 硕 (93)
- 《兰亭序帖》辨妄举例 李长路 (94)
- 《兰亭》辨妄举例小补 李长路 (109)
- 从《萧翼赚兰亭图》谈到《兰亭序》 史树青 (115)

下 编

- 柳子厚之于兰亭 章士钊 (1)
- 《兰亭序》的真伪驳议 高二适 (4)
- 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《兰亭序》 商承祚 (11)

插图目录

- 一 东晋谢鲲墓志…………… (上编 25)
- 二 东晋谢鲲墓志拓片…………… (上编 25)
- 三 东晋颜谦妇刘氏墓志拓片…………… (上编 26)
- 四 东晋兴之夫妇墓志拓片 (正面) …… (上编 27)
- 五 东晋兴之夫妇墓志拓片 (背面) …… (上编 28)
- 六 东晋刘尅墓志拓片 (正面) …… (上编 29)
- 七 东晋刘尅墓志拓片 (背面) …… (上编 30)
- 八 齐刘覬买地券拓片…………… (上编 31)
- 九 齐刘覬买地券释文…………… (上编 32)
- 十 严可均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…………… (上编 34)
- 十一 褚摹兰亭颖上本…………… (上编 39)
- 十二 东晋王闳之墓志拓片 (正面) …… (上编 53)
- 十三 东晋王闳之墓志拓片 (背面) …… (上编 54)
- 十四 东晋夏金虎墓志拓片…………… (上编 55)
- 十五 南朝陈留周叔宣母黄夫墓砖志拓片…………… (上编 56)
- 十六 南朝济阳圉蔡冰字道坚砖志拓片…………… (上编 57)
- 十七 东晋青瓷鸡头壶残器…………… (上编 58)
- 十八 东晋青瓷鸡头壶底字款…………… (上编 58)
- 十九 东晋青瓷鸡头壶底拓片…………… (上编 58)
- 二〇 刘宋明昙德墓志拓片…………… (上编 59)
- 二一 北齐李清言碑…………… (上编 66)
- 二二 北周天和二年造像铭记…………… (上编 66)
- 二三 北齐朱岱林碑…………… (上编 67)
- 二四 东魏司马昇墓志铭…………… (上编 67)
- 二五、西晋咸宁四年吕氏砖…………… (上编 67)
- 二六、北齐武平四年高侨为妻王江妃造衣物券…………… (上编 68)
- 二七、南北朝河南邓县战马画像砖墨迹…………… (上编 68)
- 二八、八大山人临《临河序》…………… (上编 74)
- 二九、八大山人临《临河序》及跋…………… (上编 75)
- 三〇、旧刻兰亭集序…………… (上编 72)
- 三一、北宋文勋字迹…………… (上编 76)
- 三二、南宋张栻等字迹…………… (上编 76)

- 三三、南宋楼钥等字迹…………… (上编 76)
- 三四、东吴永安五年“彭卢买地铅券”(摹本)…………… (上编 93)
- 三五、晋时“永”、“九”、“年”等字写法…………… (上编100)
- 三六、晋泰始五年简…………… (上编108)
- 三七、晋杨阳神道残石…………… (上编108)
- 三八、晋王君题字…………… (上编108)
- 三九、晋仲举等字残志…………… (上编108)
- 四〇、晋节字残石…………… (上编108)
- 四一、刘宋石佛记残石…………… (上编108)
- 四二、后秦妙法莲花经…………… (上编104)
- 四三、晋五月十四日文书…………… (上编112)
- 四四、晋八月廿五日文书…………… (上编112)
- 四五、晋三月一日文书…………… (上编112)
- 四六、晋张超济文书…………… (上编113)
- 四七、晋代文书两片…………… (上编114)
- 四八、晋三月十四日文书…………… (上编114)
- 四九、晋九月十一日文书…………… (上编114)
- 五〇、传闾立本《萧翼赚兰亭图》卷…………… (上编115)
- 五一、《兰亭序帖》和、兰、群、暎、流…………… (上编119)
- 五二、智永《真草千字文》和、兰、群、暎、流…………… (上编119)
- 五三、太元十口年东寿墓墨书铭记(摹本)…………… (下编 26)
- 五四、西汉子和少公木简…………… (下编 26)
- 五五、东晋永和二年玉门官阶次行木简…………… (下编 26)
- 五六、东汉熹平元年朱书解殃瓶…………… (下编 26)
- 五七、晋铠曹木简…………… (下编 26)
- 五八、晋帐下将薛明木简…………… (下编 26)
- 五九、魏景元四年幕下史索卢木简…………… (下编 26)
- 六〇、焉耆玄纸本尺牒…………… (下编 27)
- 六一、晋郭思永瓷笈(拓本)…………… (下编 27)
- 六二、吴葛府君碑…………… (下编 27)
- 六三、永和十三年霍君墓壁墨书铭记(摹本)…………… (下编 27)
- 六四、晋为世主纸本尺牒…………… (下编 28)
- 六五、晋一日纸本尺牒…………… (下编 28)

图 版 目 录

- 壹 唐人摹《兰亭序》(神龙本, 部分)
- 贰 《爨宝子碑》和《爨龙颜碑》(部分)
- 叁 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《三国志》残卷
- 肆 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《三国志》残卷
- 伍 1. 东晋兴之夫妇墓志(正面) 2. 东晋兴之夫妇墓志(背面)
- 陆 东晋王丹虎墓砖志拓片
- 柒 东晋王闳之墓志(正面)
- 捌 东晋王闳之墓志(背面)
- 玖 1. 东晋后凉麟嘉五年写维摩经 2. 刘宋大明八年刘怀民墓志 3. 晋人书三国志吴志
- 拾 1. 西晋太康五年杨绍买地券 2. 西晋元康六年诸佛要集经
- 拾壹 1. 西晋永嘉四年文书 2. 东晋王羲之十一月十三日帖
- 拾贰 1. 前凉李柏文书(一稿) 2. 前凉李柏文书(二稿)
- 拾叁 1. 西晋陆机平复帖 2. 西凉建初十二年写经
- 拾肆 1. 西汉神爵四年简(上) 2. 西汉神爵四年简(下) 3. 东汉永寿二年瓮 4. 东汉熹平元年瓮摹字 5. 东汉建宁元年张寿碑
- 拾伍 1. 东汉光和元年铅买冢地券 2. 东汉建光元年冯焕神道阙 3. 魏景元四年简 4. 东汉永和二年简 5. 魏十三字残碑
- 拾陆 1. 东晋王羲之丧乱帖 2. 丧乱帖局部(左)、孔侍中帖局部(右)
- 拾柒 东晋王羲之孔侍中帖
- 拾捌 1. 东晋王羲之近得书帖 2. 东晋王羲之四月二十三日帖

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 《三国志》残卷

郭沫若

公元一九二四年，新疆鄯善县曾出土一份晋人写本陈寿《三国志·吴志》残卷，起自《吴书·虞翻传》“权于是大怒”句的“怒”字，终于《张温传》“臣自入远境”句的“境”字。计共八十行，中有残损，存一千九十余字。这份残卷已流入日本，国内幸有影印本流传，我所见到的有两种：一种收入罗振玉编印的《汉晋书影》（1926年增订本）^⑤，另一种收入中华书局标点《三国志》卷一卷首（1962年印行）。前一种原大，第二种缩小，但前一种剪去了残卷第一行的四个残字，是人为的缺陷。关于这一份残卷，张元济在所著《校史随笔》（1938年）中论述甚详，他曾将古写本与宋刊本《三国志》对校，大有收获。张谓“写本略有舛误，然大都胜于宋本”。特别是写本《张温传》中有“大构于丕”句，宋本“丕”字作“蜀”，大背史实。张谓“宋本‘蜀’字实讹，而写本‘丕’字为正，诚可谓一字千金矣！”张氏的核订，至为精确。

我现在所要叙述的新出土的晋人写本《三国志》残卷，是另一种写本，以一九六五年一月十日出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吐鲁番。新疆同志在吐鲁番的英沙古城之南、距城北苏公塔一公里光景的一座佛塔遗址中发现了一个陶瓮，瓮外有铁鏃木箭二十余支，瓮内有写本佛经残卷十三种、桦树皮汉字文书、梵文贝叶两片和其他写本等。在这些写本中就有这一份新出晋人写本《三国志》残卷（图版叁、肆），存四十行，凡五百七十余字，中有残缺。内容写的是《孙权传》，存建安二十五年的后半和黄武元年的前三分之二。第一行仅存一“巫”字左侧残划，是原文“是岁刘备帅军来伐至巫山秭归”的“巫”字的剩余；最终一行是“救诸军但深沟高垒”句至“高”字止。

两种残卷比较，字迹十分类似，捺笔极重，隶书气味很浓厚。但两者决不是一个人写的：第一，行距与每行字数不同，甲种行距较宽，行十四五字，乙种行距较狭，行十六七字；第二，字的结构也有所不同，如“免”字，甲种无变异，乙种均写作“勉”，连“俛”（俯）字也误写作“勉”；第三，出土地不同，一出在鄯善，一出于吐鲁番。从书法的角度看来，乙种的字迹较优于甲种；但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，乙种却不及甲种有所贡献。我也曾经把乙种和宋刊本核对过，在文字上彼此小有短长。择其要者，列表如下：

^⑤《汉晋书影》有两种版本，初版印行于1918年，无晋人写本《三国志》残卷；1926年再版时始增入，但目录仍旧，亦无跋语说明。可见编印者疏忽之至。

(新出写本)

“据三州而虎视于天下。”

“潘阳言黄龙见。”

“君生于扰攘。”

“埋而掘之，古人所耻。”

“犹冀言之不信。”

“口陈指靡。”

(宋刊本)

无“而”字，殆夺。

“潘”作“鄱”，殆误。

下有“之际”二字，较长。

“古人”下有“之”字。

“之”作“者”。

“靡”作“磨”，系抄本之误。

乙种“写本所用纸”，有的同志推测：“可能是‘左伯纸’，写本应是《三国志》成书后不久，新疆人民传抄的。”左伯是东汉东莱县人，制纸有名。据说“蔡邕作书，用张芝笔、左伯纸、韦诞墨。”（见《三辅决录》）估计，左伯当是东汉晚期的人。写本用纸究竟是否“左伯纸”，不能肯定。但写本是晋代所书，毫无问题。陈寿仕晋为著作郎，终于御史治书。《三国志》定稿当在西晋时。西晋统治仅仅五十三年，抄本传入新疆，或为新疆人民所传抄，为时当在东晋时代了。就字迹看来，乙种写本当比甲种较早，可能乙种是西晋抄本，甲种是东晋抄本，但相距的年代，毕竟不会太长。

前几年新疆吐鲁番出土了卜天寿的《论语·郑玄注》抄本，若羌县米兰古城又出土了《坎曼尔诗笈》，都是唐代的文物。我曾根据它们驳斥了苏修的官僚和所谓“学者”们的澜言，说“中国的西界从来没有逾越过甘肃和四川的西部”。他们恼羞成怒，骂我在别人的文章上“署名”、所根据的资料不可靠。那些碰壁的苍蝇们敢于不顾事实，展翅嗡嗡，不忙说他们把列宁主义玷辱得不成名器，连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我对于他们觉得可鄙、可耻，但也觉得可悯、可笑。他们不愧是赫鲁晓夫的门徒，青出于蓝，竟远远把赫鲁晓夫超过了。现在又有晋人写本《三国志》残卷相继出土于新疆，新疆和内地文化关系的密切更提前了四百多年，且看那些苍蝇们又会怎样的嗡嗡叫吧。

看到两种晋人写本《三国志》残卷，自然而然地又联想到相传为王羲之所写的《兰亭序帖》的真伪问题。这个问题，七、八年前曾经热烈地辩论过，在我看来，是已经解决了。不仅帖是伪造，连序文也是掺了假的。看到这两种《三国志》的晋抄本，又为帖的伪造添了两项铁证。字体太相悬隔了，真是“不怕不识货，只怕货比货”，两相对比，一目了然，可以无容多话。但最近我翻阅到章士钊先生的《柳文指要》，他却十分坚持《兰亭序帖》非伪，《兰亭序文》为真，而斥持反对说者为“以一定万，以偶冒常”，“持论诡譎，不中于实”。因此，在这里又不能不把旧事重提。“以一定万，以偶冒常”，章先生以为“诡譎”，不切合实际者，其实我们的证据已不是“一”，已不是“偶”，而是相反的“万”与“常”了。即使是“一”与“偶”，也要看其性质如何，有时是也可以“定万”而“冒常”的。例如北京猿人最初只发现一个牙齿，但由一齿可以定其为猿人；出土于周口店本是偶然，但由偶然可以断其必然，即人类发展必然经过这一阶段，周口店能出土者必然在别处也会出土。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是这样，一点也不“诡譎”，而正合乎实际。又例如，上述两种《三国志》抄

本都是隶书体，虽是残卷，但我们可据以推定两种《三国志》抄本的全卷都必然是以隶书体抄写的。《三国志》的晋写本既是隶书体，则其它一切晋写本都必然是隶书体。新疆出土的晋写本是隶书体，则天下的晋代书都必然是隶书体。所谓一隅三反，所谓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而表现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在天下的书法都是隶书体的晋代，而《兰亭序帖》却是后来的楷书体，那吗，《兰亭序帖》必然是伪迹，这样的论断正是合乎逻辑的，而且也合乎辩证逻辑。然而章先生却不以为然，且看，章先生写的文章吧。

章先生在柳宗元全集中找到了两处有关《兰亭》或《兰亭序》的文字，因成《柳子厚之于兰亭》一文以阐述之（见《柳文指要》卷十三，1917页）。第一处见《邕州马退山茅亭记》，其文云：

“兰亭也，不遭右军，则清湍修竹，芜没于空山矣。”

这十八个字，于《兰亭序文》的真伪既无关系，于《兰亭序帖》的真伪更无关系。《兰亭序文》的伪迹是在后半段自“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”以下。前半段正畅叙欢乐，后半段却突然无端悲痛起来，既为刘孝标《世说新语》注中的《临河序》所无，也和王右军的性格与晋人的达观不相契合，故可断言为后人所窜入。至于“茂林修竹”、“清流激湍”等语是在前半段，《临河序》中也有。因此，把这十八个字引作证明，便毫无依附。章先生竟据以论断：“子厚确认《兰亭序》为右军作，虽未明涉及书，而书手不可能疑及右军以外之人，似不待论。”谁也没有说过《兰亭序》不是右军所作，问题是后半段是后人伪加的，但章先生却轻松地把这个问题避开了。所“待论”的正是右军以外另有“书手”，而他也轻松地把这个问题避开了。用了一个“似”字，足证章先生的自信却也并不那么坚定。

第二处见《与吕恭书》（一本作《与吕恭论墓中石书》），其文云：

“仆早好观古书，家所蓄晋魏时尺牍甚具。又二十年来遍观长安贵人好事者所蓄，殆无遗焉。以是，善知书。虽未尝见名氏，望而识其时也。（以上章氏文中未引。）又文章之形状，古今特异。〔弟之精敏通达，夫岂不究于此？〕（方括弧中文字，章文亦未引。）今观石文，署其年曰‘永嘉’。其书则今田野人所作也。虽支离其字，尤（犹）不能近古，为其‘永’字等颇效王氏变法，皆永嘉所未有。辞尤鄙近，若今所谓律诗者，晋时盖未尝为此声，大谬妄矣！”

《墓中石文》的字样究竟是怎样，无从考见。所谓“永字等颇效王氏变法”，“王氏”自指王右军，《兰亭序帖》一开始就是“永和九年”，故有“永”字。“变法”是说合正规，以效法不合正规的字迹为理由，又加以文近律诗，而严斥《墓中石文》为伪作，这里正表明着话中有话，所谓“皮里阳秋”。其意若曰：“《兰亭序帖》本来是伪迹，而你伪造《墓中石文》的人还去效法它，岂不是自露马脚？”《兰亭序帖》是唐太宗李世民所推崇的，或甚至是他所命人假托的。赵之谦在《章安杂说》中说得好：

“安吴包慎伯（世臣）言：‘曾见南唐拓本《东方先生画赞》《洛神赋》，笔笔皆同汉隶’。然则近世二王书可知矣。重二王书始唐太宗，今太宗御书碑具在，以印证二

王书，无少异。谓太宗即二王可也。”（见章钰抄本及赵氏手稿本，两者均藏北京图书馆。）

赵氏说他“此论实千万世莫敢出口者，姑妄言之。”赵氏的胆子相当大，敢于揭穿了秘密。但他如果生在唐代，也未见得就敢于“妄言”。因此，柳宗元要闪烁其辞，是可以理解的。其实章士钊先生也未尝不懂得柳氏的深意，他说：“子厚所谓‘永’字等颇效王氏变法，此尊王之辞，非鄙之也。”如果是毫无掩饰的“尊”，何致反能使人疑为“鄙”？章先生为了要自圆其说，故已自启疑窦，而又自行闭塞。章先生为文实在也是大费苦心的。由永嘉元年（公元307年）数至永和九年（公元353年），仅合四十七年。永嘉所未有的书法，何以永和便能有？！反过来，永和所能有的，何以永嘉便不能有？！二者俱伪，不是很明了吗？但柳宗元的文字也并不是鄙薄王右军，而是鄙薄作伪者，明知其伪，特不敢直斥其伪而已。李白要胆大一些，他有诗句云：“《兰亭》雄笔安足夸！”（《鲁郡尧祠送薄华》）“雄笔”是别人称为“雄”，“不足夸”是由于知道有人作假。在《草书歌行》中说得更为痛快：“王逸少，张伯英，古来几许浪得名！”这不仅点破了王右军书多伪迹，而且也点破了张伯英书也多伪迹。毫无成见地实事求是地看问题，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。

不过，《兰亭序帖》虽伪，并不贬低它的价值，只是它不是王右军所书而已。不仅字迹不是王右军所书，序文的后半段也不是王右军所作；这样说也并不贬低王右军的价值。一定要坚持《兰亭序文》的后半段绝非伪作，那倒是有损于王右军的。这些话，几年前已经说得很多，在这里不再多说。

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七日

（原载《文物》1972年第8期）

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

郭沫若

一 王兴之夫妇墓志

近年，在南京郊外及其近境出土了几种东晋时代的墓志。就中以《王兴之夫妇墓志》（图版伍）与《谢鲲墓志》（图一），最有史料价值。

《王兴之夫妇墓志》（图四、五），以今年（1965年）一月十九日出土于南京新民门外人台山，一石两面刻字。一面的刻字是：

“君讳兴之，字稚陋。琅耶临沂都乡南仁里。征西大将军行参军，赣令。春秋卅一。咸康六年十月十八日卒。以七年七月廿六日葬于丹杨建康之白石，于先考散骑常侍、尚书左仆射、特进卫将军、都亭肃侯墓之左。故刻石为识，藏之于墓。

长子闾之。女字稚容。

次子嗣之，出养第二伯。

次子咸之。

次子预之。”

另一面的刻字是：

“命妇西河界休都乡吉迁里，宋氏名和之，字秦嬴，春秋卅五。永和四年十月三日卒。以其月廿二日，合葬于君柩之右。

父哲，字世儻，使持节散骑常侍、都督秦梁二州诸军事、冠军将军、梁州刺史、野王公。

弟延之，字兴祖。袭封野王公。”

兴之虽未着姓，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的同志们考证为王彬之子，是确切不可易的。

《晋书》卷七十六《王彬传》云：“彬字世儒，……与兄虞俱渡江。……豫讨华軼功，封都亭侯。……苏峻平后，改筑新宫，彬为大匠。以营创勋劳，赐爵关内侯，迁尚书右仆射。卒官，年五十九。赠特进卫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谥曰肃。长子彭之嗣，位至黄门郎。次彪之，最知名。”

王彬是王正的第三子，其长兄为虞，次兄为旷。旷即王羲之的父亲。王氏的原籍是琅琊临沂，郡望既合，年代亦无不合。其他和石刻中所述有关“先考”的爵位、官职、谥号，也都相符。

晋成帝咸康六年为公元三四〇年，兴之年三十一岁，则当生于晋怀帝永嘉三年，公元三〇九年。东晋以三一七年成立，他是在童年时代，随着父兄南渡的。

王彬之子除彭之、彪之外，据《世说新语·人名谱》，尚有一人名翹之，曾任光祿大夫。今又有兴之，足见王彬有子四人，而不是仅仅两人了。

“征西大将军”应是庾亮。《晋书·庾亮传》：（成帝咸和九年公元334年）“陶侃薨，迁亮都督江、荆、豫、益、梁、雍六州诸军事，领江、荆、豫三州刺史，进号征西将军。”

“行参军”者，据《隋书·百官志》在左右卫、左右武卫、左右武侯各大将军之下都有行参军，是比较低级的属吏。左右卫、左右武侯各六人，左右武卫各八人。隋制盖因袭晋制。

庾亮以咸康六年正月卒，先于王兴之之死半年以上。王兴之盖先为庾亮的行参军，后升为赣县县令。赣县在晋属江州南康郡。

王羲之亦曾参庾亮军，是则兴之与羲之，不仅是从兄弟，而且还曾经共事。兴之小羲之三岁。有人拟议：《兴之夫妇墓志》，可能是王羲之所书。考虑到羲之与兴之的关系，更考虑到《兴之墓志》只书名而不着姓，显然是王家的亲人自己写的，王羲之为兴之夫妇写墓志的拟议，看来不是毫无根据的。

然墓志中称谓是从写作者的身分出发，如称兴之为“君”，称兴之妇为“命妇”。《兴之墓志》中称王彬为“先考”，可见写墓志的人是兴之的胞兄弟，即当于彭之、彪之、翹之三人中求之。三人中究为那一人虽无法断定，但墓志非王羲之所书则是可以断定的。

当然，先考的称谓，有时只就墓主的身分而言。如北魏元诱妻薛伯徽墓志云：“先考授以礼经”（见《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》图版一三八），又唐吕巖撰张軫墓志云：“先考隋朝散大夫著作郎”（见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五十四卷29页），即其证。然在《兴之妇墓志》中，宋和之的亡父，却只称为“父”而不称“先考”，可见书属墓志者在称谓上是有所区别的。故《兴之墓志》中之“先考”，不仅单就兴之而言，实表示书属墓志者与王彬亦有父子关系。

建康即今之南京，在晋属丹阳郡。原名秣陵，汉献帝建安十六年所置。孙权改为建业。晋武帝时复为秣陵。太康三年分秣陵之水北为建业。后避愍帝讳，改称建康。

《晋书·职官志》：“散骑常侍，本秦官也。秦置散骑，又置中常侍。散骑，骑从乘舆车后。中常侍，得入禁中。……魏文帝黄初初置散骑，合之，于中司掌规谏，不典事。……至晋不改，及元康中，惠帝始以宦者董猛为中常侍，后遂止，常为显职。”

“仆射，服秩印绶与〔尚书〕令同。案汉本置一人，至汉献帝建安四年，以执金吾荣邵为尚书左仆射。仆射分置左右，盖自此始。经魏至晋迄于江左，省置无恒。置二，则为左右仆射。或不两置，但曰尚书仆射。〔尚书〕令缺，则左为省主。若左右并缺，则置尚书仆射以主左事。”

又“特进，汉官也。二汉及魏晋以加官从本官车服，无吏卒。”看来是官上加官的意思。卫将军有左右，职位颇高。

根据《晋书·王彬传》的叙述看来，王彬是以尚书左仆射为本官，特进卫将军和散骑常侍都是死后的官上加官。王彬的地位在当时是相当显要的。

“长子闾之。女字稚容”。

“次子嗣之，出养第二伯”。关于“第二伯”的问题，南京文管会的同志们有独到的见解。他们注意到《世说新语·轻诋篇》中的一项重要资料。“王右军在南，丞相（王导）与书，每叹子侄不令。云：虎狨、虎犊，还其所如（还象个样子）。”此下注云：

“虎狨，王彭之小字也。《王氏谱》曰：彭之字安寿，琅琊人。祖正，尚书郎。父彬，卫将军。彭之，仕至黄门郎。

虎犊，彪之小字也。彪之字叔虎，彭之第三弟。年二十而头须皓白。时人谓之‘王白须’。少有局鞵之称。累迁至左光祿大夫。”

文管会来函云：“考注中彪之为彭之第三弟，又字叔虎，如版本无误，彪之尚有一第二弟。抑即翹之，或另有其人，早卒或无后，故以嗣之过继。”这说法是正确的。版本可无问题，日本金泽文库藏宋本、四库丛刊影印明本均作“第三弟”。我意，翹之当即第二弟，兴之则是第四。此可补《晋书·王彬传》的简略。又王彪之长兴之五岁，活到孝武帝太元二年（公元377年），年七十三，后于兴之之死三十七年。他有两个儿子，曰越之，曰临之（见《晋书·本传》）。

王兴之的岳父宋哲，名见《晋书·元帝纪》：“建武元年（公元317年）春二月辛巳，平东将军宋哲至。”他是来传达晋愍帝遗诏，要当时的琅琊王司马睿即帝位的。所以宋哲是所谓辅命之臣。晋时的将军本分四级，曰征，曰镇，曰安，曰平；东西南北都有。宋哲当时为平东将军，可见是第四级。后来升了官，晋封公爵，但《晋书》中无传。其子宋延之亦无传。

《晋书·职官志》云：“魏文帝黄初三年，始置都督诸州军事，或领刺史。……及晋受禅，都督诸军为上，监诸军次之，督诸军为下。使持节为上，持节次之，假节为下。使持节，得杀二千石以下。持节，杀无官位人；若军事，得与使持节同。假节，唯军事得杀犯军令者。江左以来，都督中外尤重，唯王导等权重者乃居之。”今考宋哲以“使持节”冠于中外诸官职之上，其权重殆几乎和王导相等。《晋书》何以不为立传？殊觉可异。

二 谢 鯤 墓 志

谢鯤墓志（图二），以一九六四年九月十日，出土于南京中华门外戚家山残墓中。文凡四行，横腰被推土机挖去数字，但大抵可以意补。其文如下：

“晋故豫章内史，陈〔国〕阳夏，谢鯤幼與，以泰宁元年十一月廿〔八〕亡，假葬建康县石子岗，在阳大家墓东北〔四〕丈。妻中山刘氏，息尚仁祖，女真石。弟褒幼儒，弟广幼临。旧墓在茭阳。”

谢鯤，石刻作谢鯤，鯤字变从角作，乃讹字。鰥字亦有从角作者。碑刻中这样偏旁讹误字多见，如竹头变作草头，示旁变作禾旁，双人旁与单人旁互易，日字旁与目字旁互易，等

等，举不胜举。谢鲲是东晋初年的名士。《晋书》卷四十九《谢鲲传》云：“谢鲲字幼舆，陈国阳夏人也。……鲲少知名，通简，有高识，不修威仪。好老、易，能歌，善鼓琴。……避地于豫章。……以讨杜弢功，封咸亭侯。”大将军王敦要背叛当时的朝廷时，他曾经婉谏。

其后，谢鲲赴豫章郡太守任。史称其“莅政清肃，百姓爱之。寻卒官，时年四十三。……追赠太常，谥曰康。”

他是王衍的四友之一。《晋书·王澄传》“时王敦、谢鲲、庾歆、阮修，皆为衍所亲善，号为四友。”

其子谢尚及从子谢安等《晋书》中均有传。

《谢尚传》：“谢尚字仁祖，豫章太守〔谢〕鲲之子也。……十余岁遭父忧。”

《谢安传》：“谢安字安石，尚从弟也。父衰，太常卿。”此《晋书》中之衰，即石刻中之褒。

《晋书》称“豫章太守”，《世说新语》及刘孝标注所引《晋阳秋》也同样称“豫章太守”，但石刻则作“豫章内史”。考《晋书·职官志》：“诸王国以内史掌太守之任”。又云“王，改太守为内史”。太守与内史，职权相同，只是名称上有点差别而已。但豫章郡不属于王国，而太守却也可以称为内史，可见到了东晋，连这点称谓上的小差别都在无形中消失了。

《世说新语·人名谱》中有《陈国阳夏谢氏谱》，谢鲲列于第二世，其弟有衰而无广。关于谢衰的叙述如下：

“衰，衡子，字幼儒。太常卿，吏部尚书。”

据石刻，谢鲲“以太宁元年（公元323年）十一月廿八亡”，逆推四十三年，可知鲲生于晋武帝太康元年（公元280年）。他是西晋初年的人，经历了永嘉南渡，而属于所谓“渡江名士”之流。

太宁元年在南渡后仅仅七年，当时的名士们不用说是还想恢复中原的。有名的“新亭对泣”的故事，值得在这儿引用一下：

“过江诸人，每至美日，辄相邀新亭，借卉饮宴。周侯（顛）中坐而叹曰：‘风景不殊，正自有山河之异。’皆相视流泪。唯王丞相（导）愀然变色曰：‘当共戮力王室，克复神州，何至作楚囚相对？’”（《世说新语·言语篇》）

这很鲜明地表达了“渡江名士”们的心境。这同一心境，在这《谢鲲墓志》里也表达出来了。所谓“假葬建康县石子冈”，所谓“旧墓在茨阳”，都是没有忘记还要“克复神州”的。南宋陆游辞世时的诗句，有“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毋忘告乃翁”之语，这同样的遗憾，尽管谢鲲如何旷达，恐怕在弥留时也在脑子里面萦回过的。暂时埋在南方，将来还要归葬于“旧墓”。这个希望虽然落了空，但《墓志》却在今天重见天日，这在谢鲲倒是意想不到的幸运了。

“石子岗”见《三国志·吴志·诸葛恪传》，言“建业南有长陵，名曰石子岗。葬者依焉”。《世说新语·言语篇》“高座道人作汉语”条下刘孝标注引《塔寺记》：“尸黎密（西域人），冢曰高座，在石子岗，常行头陀。卒于梅冈，即葬焉。”又《陈书·任忠传》，

“隋将韩擒虎自新林进军，忠乃率数骑，往石子冈降之，仍引擒虎军共入南掖门。”

“阳大家”即阳大姑，古晋家与姑通。《尔雅·释亲》“父之姊妹为姑”。准《兴之墓志》称“葬于先考墓之左”，又准同时代的颜含后人之墓集中埋葬于南京老虎山南麓（详见下），可以推定此人可能是谢鯤之姐，南渡后死于江左。有的同志不同意这个意见，认为“阳大家”非谢氏族人，乃原葬在石子岗者，证据是《世说新语·伤逝篇》有卫玠以永嘉六年丧的记载，注云：“永嘉流人名曰玠，以六年六月廿日亡，葬南昌城许徽墓东。”

今案许徽与卫玠的关系，注中并未说明。在我看来，两人可能非亲即友。朋友，在旧时是五伦之一，并不是毫无关系的。但“阳大家”究竟是否谢鯤之姐，我只说是“可能”，并未断定。希望“阳大家”之墓将来也有被发现的一天。

谢鯤的妻是“中山刘氏”，可能和刘琨有些瓜葛。《晋书·刘琨传》：“刘琨字越石，中山魏昌人，汉中山静王胜之后也。”

谢鯤有子二人，长子早没。次子即谢尚。《晋书·谢尚传》称：尚“七岁丧兄，哀痛过礼，亲戚异之。”“善音乐，博综众艺。”“袭父爵咸亭侯。”“永和中，拜尚书仆射，出为都督江西、淮南诸军事，前将军、豫州刺史、给事中、仆射如故，镇历阳，加都督豫州、扬州之五郡军事，在任有政绩。”后留京师，署仆射事。“寻进号镇西将军，镇寿阳。”“升平初，又进都督豫、冀、幽、并四州”诸军事。病卒，年五十，无子。史称东晋有钟石之乐是由谢尚创始的。

谢裒有六子，奕、据、安、万、石、铁；安最有名。孝武帝太元八年（公元383年）前秦苻坚进攻东晋，号称百万之众。谢安被任为征讨大都督。后击败苻坚于肥水，这是历史上有名的肥水之战。战胜后，谢安“以总统功进拜太保”。继复自请北征，遂进都督扬、江、荆、司、豫、徐、兖、青、冀、幽、并、宁、益、雍、梁十五州军事，加黄钺。真是显赫无比了。但他的北伐并没有成功。卒时年六十六。

三 由墓志说到书法

一九五八年，在南京挹江门外老虎山南麓，发掘过四座东晋墓，都是颜姓一家的。（详见《考古》1959年6期《南京老虎山晋墓》。）其中一号墓出土了一种砖刻的墓志，其文为：

“琅耶颜谦妇刘氏，年三十四。以晋永和元年七月廿日亡，九月葬。”（图三）

颜谦见《晋书·颜含传》，他是颜含的第二子。颜含被列入《孝友传》中，是“琅耶莘（县）人”，为人厌恶浮伪，不信卜筮，反对权豪。虽官至右光祿大夫，而生活朴素，为世所重。“致仕二十余年，年九十三卒，遗命素棺薄敛”。这样的人，在崇尚浮华的东晋当年，是别具风格的。

颜含有三个儿子，长子名髦，次子名谦，第三子名约。据说三人“并有声誉”。长子做过黄门郎，侍中和光祿大夫。次子颜谦官至安成太守，安成郡在今江西新喻和湖南萍乡一带。第三子做过零陵太守。老虎山三号晋墓出土了一个石章，曰“零陵太守章”，那便是颜